


刘宾雁 著

我的自白

 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我 · 的 · 自 · 白 ·

刘宾雁

代 告 学 书
当 报 文 丛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曹辉禄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我的自白

作者 刘宾雁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5

印数 1—100,000册 字数200千

ISBN7—5411—0428—0/I·398

定价：4.30元

目 录

我的自白（代序）	（ 1 ）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 8 ）
白衣下的污垢	（ 53 ）
中国有个唐安华	（ 57 ）
拨开长安雾一层	（ 93 ）
犹闻秦钟汉鼓声	（ 164 ）
古堡今昔	（ 209 ）
告诉你一个秘密	（ 241 ）
孤雁离失记	（ 271 ）
从泥潭到高峰	
——关于改革的先行者的第一个报告	（ 305 ）

我的自白（代序）

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

提问题的人，意思是不一样的。

一种人，支持我写下去，但不明白：你怎么有这大胆子呢？
受过二十多年罪，就不怕再来一次吗？

另一些同志，也是出于关心，劝阻我，说：你总不能不考虑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对你的看法吧？写下去恐怕于你不利。还是写小说吧！

还有一些同志，也主张我去写小说，因为那才能真正确立我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南京大学，当我演讲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递上一个条子，写的是：“你不认为你的作品尽管现在看的人很多，十年、二十年或几百年后会无人问津吗？”

小时候，我大概有一点艺术家的气质。我常常耽于幻想；我喜欢画画，唱歌，更喜欢写一些不象样子的诗和散文。十四岁上，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我想当演员；想做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豪”呢。梦想过当我成名后回到家乡城市时，大路两侧家家的窗子里都向我身上扔来彩色的纸带和纸屑……

忽然，有一个东西打破了我这幻想，闯进我的生活：日本人在占领东北六年之后又入侵关内，中国人全都要当亡国奴了！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周围的市民们都在议论：中国打不过日本，非亡国不可了。于是一个问题就缠住了我：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就打不败小小的日本呢？

父亲失业后，家里的积蓄吃光了。我又想：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人们有穷富之分呢？……

政治兴趣开始压倒文学兴趣了。一个性格特征开始出现：我老是想弄明白一些问题。十四岁的时候，一个问题使我苦恼很久。我受在俄国当过华工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倾慕苏联。但是苏联为什么忽然侵入了芬兰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该欺凌小国呀！

渴望了解这个世界。想弄清的问题，常常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无关系。芬兰是第一个。还有呢：为什么中国和俄国男多女少，而日本和英国却女多男少呢？结论是荒唐的：大概是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差异造成的。

求知成为我生活的乐趣。喜欢起理论来，因为要从那里找寻生活中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并不是思辩型人物的材料。我喜欢新鲜的、杂多的色彩和音调，而讨厌任何刻板、单调、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数理化毫无兴趣，一窍不通。生物课本该是兴趣盎然的，但教科书上刻板的叶脉和老师枯燥的讲法，加上他老看天花板（据说是给女生讲课时养成的习惯），又爱打哈欠，剥夺了我对大自然的兴趣。不喜欢抽象，却珍视有创见的哲理。仍然喜欢文学，但偏爱内容比较复杂、思想不那么浅显的作品。

四十年代后期起，读苏联作品的原作较多。也曾想写过那个时期的苏联那一类作品，但始终没有强烈的冲动。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开始感觉到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了：要求一律；整体似乎要吞并个性；易于满足，从另一面抑制了个人身上的活力和创造、进取精神。罗立正（《在桥梁工地上》）和马文元（《本报内部消息》）那种人物老是吃香，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对理论的兴趣骤然淡漠下来了。老是重复已知的东西，很少创见，也不鼓励创见，连语言都是干燥和灰色的。于是我便到生活中去寻求生活中问题的答案了。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历史的反省，“干预生活”文学潮流的出现，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内部矛盾的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几乎发生在同时，证实了也发展了我的一个思想：文学和新闻对生活的态度，应该有点批判性。一九五五年对我一篇作品的手稿的批判，已经上纲到“反党思想”的高度，却没有使我有警觉和收敛，几个月后我在兰州黄河大桥工地上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同我几年来意欲创作的一个主题十分合拍，不久，用了几天工夫就写出了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同志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上给予的评价和这篇作品引起的反响，令我感到意外。现在看，大约因为它是一九四二年以来第一篇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内部的作品。

《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五七年一月，一股自发的反右形势已经出现，我没有介意。四月末去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同志的冷冰冰的面孔和姚文元对我不礼貌的沉默，也未引起我的警觉，我还在继续向罗网扑去。直至宣布我为右派的前几天的党小组会上，我还对“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标准提出疑问，为什么主张整风、反对官僚

主义、反对保守的人是“右”，而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则成了左呢！

这种天真和对自我安全上的迟钝，原来是我一贯的顽症，连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都医治不了。一九七二年，经过六年审查和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牛棚生活之后，我回到“革命同志”中间来了。第一次理论学习讨论会上，我的发言就被报告上去，从此每次发言都被革命警惕性高的同志作为“新动向”仔细记录下来、反映上去，我本人竟毫无察觉。以为既是学习、既是讨论，自然该各抒己见，而我又恶习不改，总想发表点自己真正的、与众不同的疑问或体会！

“秉性难移”。一九七九年初右派问题刚刚改正，就故态复萌，讲话不写发言稿，写文章畅所欲言，使一位有过同样命运，但我年轻八九岁的作家都吃了一惊。

这是“勇敢”吗？我认为不是。只不过没料到有什么危险，或把危险估计得过低而已。《人妖之间》的出笼，也是如此。当时只不过觉得需要这样写，党中央也会允许这样写而已。

比如，一九七九年五月，当我在哈尔滨举行的黑龙江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二十二年来第一次当众发表讲话时，我若能料到身旁那一男一女两位团省委副书记早有准备、仔细记录、会后立即到楼下向省委书记汇报、当晚就要检查录音带的话，我还敢那么放肆吗？多半会谨慎得多。老实说，没有那么大胆子。

但是，一个月后，~~接着~~着手写《人妖之间》时，本应惊魂未定，却不知怎么着，又把那场教训给忘了。

两年以后，在几个省被告了几状，官司几年打不完的局面出现以后，情况倒有了点变化。也不是变得更勇敢，而是更麻木了。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一种动物嘛。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见母亲教训父亲，说他不会“来

事”，不会说一定场合应该说的假话。看来，可能有点遗传。

天真，往往会带来自作多情。更糟糕的是因此又在别人并不那么自信的地方，天真汉则表现为执拗和顽固，屡教不改。

我比不上许多始终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的同志，没有那么坚定。也比不上七七年被处死于上海的华东师大数学系毕业生王申酉那样的同志，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能力要迟钝得多。但有一点自作多情，爱关心一些甚至管一些事，虽然那早已是被我的“政治身分”免除了的义务。

从一九七二年起，也就是刚刚走出牛棚，吸到一点中国公民才允许呼吸的空气，对中国之命运的关注就揪住了我。我一生中第二次理论学习热就开始了。

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我心中开始了第三个政治青春。到处探听小道消息，认定“四人帮”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但是这段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呢？社会动乱？又一次内战？……我到中外历史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象很多同志一样，我也读起《资治通鉴》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开始。我胸中积怒和郁闷难泄，又做起童年的梦来。那时，我幻想过从高楼上垂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在公共汽车上设想：找哪几个最简单的文字或符号，夜间疾速写到闹市路旁的墙上，把江青的末日已到、中国即将天晴这个意思昭示出来？当然，我不会有这样的勇气，生活也不需要我去冒险了，这项工作很快就由英勇的南京大学的學生做起来了。听到他们在京沪列车上用柏油涂刷的反“四人帮”大标语那个消息，我兴奋不已，暗暗喝采。

同辈作家有时开我的玩笑，说：“看，刘宾雁又在作思索状

了！”其实我很少拿出时间认真思考什么问题。也许由于我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信息来源，因而更珍视难得的信息。其实我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只不过对一些新鲜的现象感到好奇罢了。例如，一九七四年河南为抑止社会犯罪浪潮而在国庆前发动的全省“红色风暴”，把一大批青少年抓起来，挂上大牌子放到卡车上四处示众，并由本人自报年龄、家庭成分、所犯罪行；七九年在黑龙江听到“盲流屯”、“光腚屯”里重新出现的“头人”式人物的黑暗统治；从张志新、史云峰、石红霞等烈士到没有封为烈士的王申酉等中华精英的悲剧；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那里人的地位及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将要发生的影响……这些事件和现象，倒曾经使我惶惑、震惊、兴奋，总起来说是好奇，于是，那些印象便在心底自发地沉淀下来，积累起来，形成为潜在的意识流。各种印象撞击、溶合的结果，有时会冒出一个思想，一个小小的发现，也是一种乐事。

七九年以来，信息骤然增多。书比过去多多了，却没有了读书的时间。这是一个悲哀。

不是不想写小说。那东西硬是比报告文学更艺术。老实说，我是心虚。不大看小说，少说也有二十几年了。越是看得少，越是不写，越觉得那东西神秘，也越是佩服小说家。现在，有时觉得连编个故事都很难。想象力，大概被中国生活的超级现实性和自己写作的纪实性给榨干了。当然，也不是佩服任何一位小说家和赞赏任何一部小说。

同时，正因为把小说看得很高级，就觉得若站不到一定的高度，就愧对小说创作；若只能写出不痛不痒的作品，就把小说糟蹋了。

明知写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工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不管怎么说，我写的是事实，而由于经过选择，就不会没有一点价值。写出来，即使“十年、二十年后无人问津”，至少不会立即变成废纸。将来，也有点史料价值吧！

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所无法发挥的作用。它能直接地对生活进程发生一点影响，能造成一点震撼，——有时候，你简直觉得那是一种能摸得着的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坏人多少起一点威慑作用，不然，他们的日子也未免过于舒适了。对于受欺压的好人，特别是由维护社会利益而被逼得难以生存的好人，多少也能起一点镇痛剂的作用。不幸的是，也许它只不过起这么一点作用而已。

如果与此同时，它还能唤醒人们尚未泯灭的天良，加深一点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增强一点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使作者分外满足了。

对于作者本人，有时也是一种镇痛剂，是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我总算做了一点这个时代有这种条件的中国人不能不做的事。

当然，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所以，又有这样的朋友，象燕祥那样，劝我不要写小说，就只管把报告文学一直写下去。

也有困难，并且不小。那就是：除了我不能不得罪的人之外，还有少数同志对于我所写的东西今天所起的作用不甚了了。因而，我是害虫乎？益鸟耶？尚难断言，有待于历史鉴定。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一九八〇年春节，四川省成都附近的新津县城里发生了一起小小事件。它象一滴浊水，把全县喜气盈盈的画面的一角给污染了。

在一次为知识分子举行的春节聚会上，主持经济工作的首长顾某人举杯敬酒。他一人一桌走过去和大家碰杯，唯独绕过了一个人，故意冷落了一位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去年得到改正的人。这个人，二十余年来首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为自己命运的巨大转折兴奋不已，正举杯要为自己、也为四川全省的喜人形势一饮而尽时，想不到受到这意外的一击，羞辱难耐，悻悻然离开了会场。

这件事立即在县城内传开，知识分子为之哗然。在纷纷谴责顾某人的这个并非疏忽的侮慢举动时，不免也分析起他此举的动机。

“大概是那人引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吧。一九五七年他打了三个右派，那个女大学生，就因为他追求过，人家没答应他……”

“很难说，我看他是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政策不满意。”

“也可能。不过我看主要还是他认为自己比知识分子高贵，

“右派”在他眼里就更不用说了。”

“哼，他高贵什么？主持经济工作这二十一年，他给全县人民干过什么好事？他不走，新津县的面貌永远改变不了！”

可惜，一个人的价值，是没有一种仪器能够测量的。顾某人和那个改正“右派”，他们各自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事业心和进取心，业务能力和文化素养，实际表现和工作成果，若能有一个天平称量一下，分个高低，那该多好！

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和表面价值往往不相一致。我们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时，是不是经常能够洞穿那表面的、并不表示他本人真实品格、才干和贡献的外壳呢？……

又一次坠落

一九六〇年，二十二岁的郑本重重返故乡——新津县。人家讲究衣锦还乡，这个年轻人却身穿一套破旧（但十分整洁）的布衣，头戴一顶“右派”帽子，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地回了家乡。看那副近视眼镜后面充满自信的眼神，黧黑面孔上一闪一闪的微笑，不仅没有一点有愧于“江东父老”的意思，甚至还有几分十年前解放大军剿匪后凯旋归来的气概呢。

行人看见这个后生，暗暗惊奇：他准是外省人，那边粮食每月定量大概比十五斤、十九斤高得多。他们哪里晓得，这个后生看见家乡不尽的江水和遍地青草，就觉得同他近两年呆过的地方相比，新津县堪称天堂了。

一九五九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的“右派”学生郑本重，抱着脱胎换骨、立功赎罪的决心连打五次报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自己。在离西宁五百公里、荒无人烟的

工地上，他充分体验了天然的和人为的艰苦：每月工资三十几元，一个人每月伙食费倒要五十多元。每人一天领到半杯水或一小块冰——要洗脸就别喝水，要解渴就别洗脸。半年理一次发，一年洗一回澡。这些，竟都未能改造掉他喜爱整洁的习惯，谁也不知道他那身衣服是怎么洗干净的。饿肚皮，吃青苔，也没整掉他乐天的气质，没整掉身上的“学生气”——爱哼个歌儿什么的。脱胎换骨，确是不易呀！

他在家乡的大江里足足泡个够、游个够、洗个够以后，就躺在沙滩上遐想起来：水呀，你原来是这么可爱的东西！活到二十一岁上，他才真正懂得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他在睡梦中都幻想过得到一杯解除干渴的水。现在，他躺在一条滔滔不尽的大江旁边，这是多么幸福！这是不是也象征着他的命运有了一个转机呢？当然是。他是学水力发电的，而四川的水力资源又冠于全国。他在这里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他不久以后真的就来到一个水电站工地。他白天施工，晚上给工人讲技术课。工人们喜欢上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干起活儿来玩儿命，可以三五个晚上不睡觉，除了那副近视眼镜，跟工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年年底，工地的基层组织打了报告，根据郑本重的实际表现，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县委一查，没有这个人的档案。写信到西北原单位查询，答复说“该单位已经撤销”。再问温江地委统战部，答称：据查，该员档案已转新津县。

郑本重挨过饿，挨过斗，从未慌过，这回他慌了。别看档案不过是一个纸口袋，它装着你的来历，你的身份，是关于你本人存在的凭证。说来也怪，失去它，郑本重大学毕业的资格、关于五七年以前历年良好表现的鉴定等等，即他的过去中那些好的东

西，便一起消失了，但是他的“右派”身份却可以完整无缺地缺存下来，而且随着档案袋的丢失，也失去了改变这个身份的依据和希望。这是最可怕的。眼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证明他来四川是经过合法手续，他可能是私自逃跑，他肯定是害怕艰苦跑回四川来的！

果然，“小四清”运动一来，“右派”身份和“私自逃跑”就使郑本重成了阶级斗争加倍理想的靶子。电站领导人举出他第一条罪状是“腐蚀工人阶级”。郑本重不服。领导人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大喊道：

“你说，你为啥给工人讲业务课？你明明自己‘白专’，还要把工人阶级也引到‘白专’道路上去，这不是腐蚀是什么！”

这是我们对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郑本重那点马列主义哪里够用？他只能无力地辩解道：

“我是搞业务的，当然只能讲点业务……”

“不对！”对方还有杀手锏，“你还用黄色的东西毒害工人阶级！”

郑本重一愣：黄色？他读过万卷书却不知何为黄色？他在大学时代谈过一点恋爱，但还不等发展到接吻的阶段，就丧失了恋爱的权利……他只是有一次应青年工人的要求讲过五十年代他看过的一部电影，其中有一对男女青年相爱的事。岂不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爱情本身就是“黄色”的了。郑本重何以辞其咎？况且，凡“黄色”皆资产阶级货色，是革命的对象，因而批判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

“郑本重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大右派，在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

“你拿出事实来！”郑本重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

他又错了。事实？在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头，事实岂能例外？突出政治，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既可以使事实为它服务，也可以根本不要事实。

这个晚上，郑本重懊丧透了，心想：“我白天黑夜干，一个月只拿二十六块钱，还搞了几项技术改革。我作事，让别人去出名、受奖，我都心甘情愿，我只求你们承认我做的是好事就行了。怎么又‘朝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了呢？看来，要整你，你是跑不脱的！”

大约是从这时起，郑本重对中国事情的认识稍稍前进了一点。档案里那几张纸，竟比他一个活人的份量还重。其实，不就是因为档案袋里的几行字，他郑本重才变成了人下人吗？为了那几行字，他已经用去几年的时间拼命工作，并且继续下定决心要付出他全部精力和时间去“赎罪”。他本来是没有罪的啊！但在他之上和在他四周，五十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奇异的强大力量，能够迫使一个好人自觉地相信自己是罪人。他要赎罪，就得工作。但是现在要想得到赎罪的机会也很难了。他的档案袋虽然后来在派出所楼上的一堆废纸底下找到了，但是由于他顶撞了领导，还是被赶出了电站。

从零开始，而且本身就是个零

郑本重现在成了一个自由人——不再从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或集体。这是一种使他感到空虚和恐怖的自由。他好象成了一个零，他对谁都没有用，谁也不需要他。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一个身强力壮、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特长的人，会对社会主义祖国没有用处。他跑到江边，望

着徒然逝去的滚滚流水——那里有多少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光明和动力白白流失到大海中去！“只需给我一点钢铁，我就能把这些水变成电力。有了这最廉价的动力，什么事办不成？更新这一排排衰朽的房屋，修复这破旧的路面……”

中国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当郑本重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孤儿时，又有一位好心人出现在他面前。四十岁上下，胖胖的廖镇长看过他的简历，打量打量他，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人总得要吃饭嘛。”沉吟半晌，好象他本人对郑本重犯了什么过错似地解释说：“你的才干，现在用不上。实在没办法，我决定不了……先委屈一下，到砂石社干几天怎么样？”

廖镇长哪里会知道，郑本重毫无挑剔之念。他象久旱盼甘露一样，只求有工作干。廖镇长看看他的身材，特别是他宽宽的肩膀，又问他：“活路重得很，你吃得消吃不消？”郑本重使劲点点头。叫他跟这胖子去赴汤蹈火，他也会在所不辞的。临别时，廖镇长握住他的手，眼睛里带着忧伤，嘱咐他说：“好生干，不会亏待你的。”

郑本重从此加入了“零工界”。这里，没有人计较他的地主家庭出身，没有人过问他是右派还是左派，不要档案，不要历史。完全按照他本人的实在价值——他能搬动多少石头，来评价他的高低，他和他们是平等的。他只需出力气干活，吃饭，再把消耗掉的力气补充起来。一顿饭，放开肚皮可以吃掉十个菜，或二斤半酱牛肉——每隔几天不这么吃一次，体力就顶不下来。

工作是最简单也是最沉重的。把二、三百公斤的石头抬上船，再从船上卸下来。郑本重在中学时代就练成的强壮体魄现在用上了。他自幼喜爱唱歌，现在在喊号子时也用上了，唯独十几年寒窗苦读积累下来的知识用不上，而且成了沉重的负担。头上